

白居易集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王汝弼
选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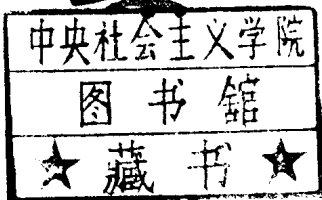
072468

王
汝
弼
選
注

白
居
易
選
集

0755/05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古典文學名家選集

呂 居 易 選 集

王汝弼選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東方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3.5 字數 312,000

1980 年 10 月第 1 版 1988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數: 52,001—58,000

ISBN 7-5325-052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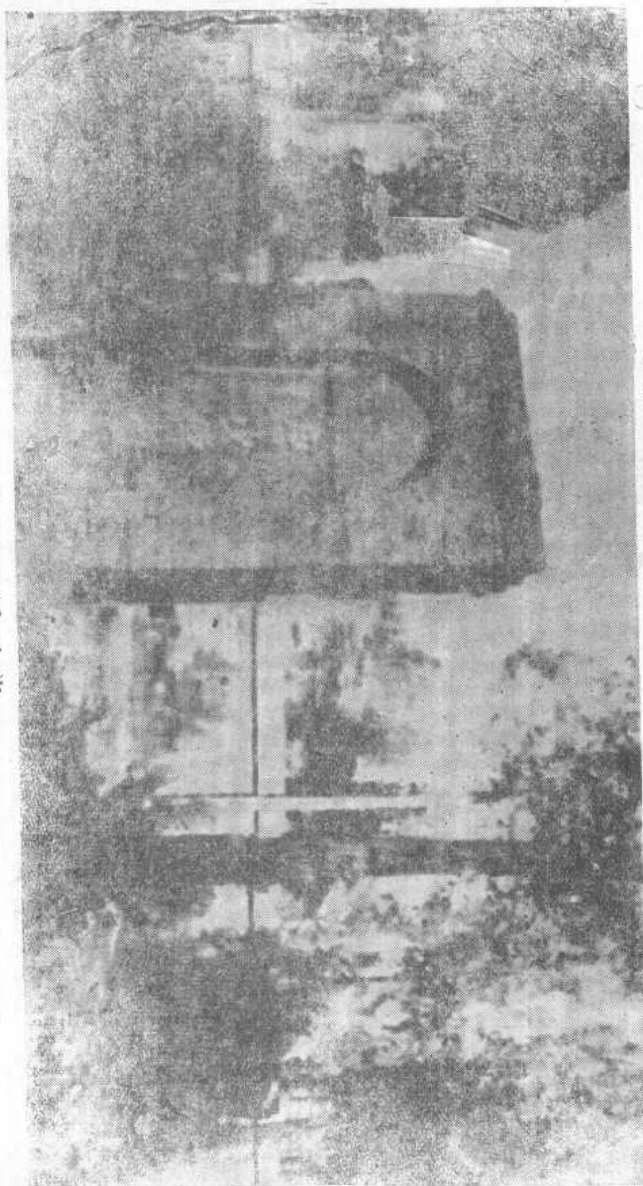
I·308 定價: 2.85 元



白居易

——從南薰殿舊藏《聖賢畫冊》

洛陽白居易墓



唐白居易書

各惟斗寒不著

動心何似居易家元稹才楊香藥子宗
直陳情事連奉三問併願馳心
治下今年早損甚蠲放太半徑寄
不充見議停減斟酌公私况可見

天可流行也取貴都太極經二玉輝照
遇立斗又如仁政否杜明春物報
且使君之仁血衆因樂改宮
敬當跪日未前月廿日惟子矣
事畢執拂時長慟而已況乎西
久及終微衣衾宜陽懷國表使

引及廣明日申真忌夜因想文介
祭敢干微誌又同使實之過一
斗士相試雖多味有盡宣就中
得同字古條敢憐而已今相公
心何此思之空名字寄長句而
或上懷我對境世十編之文錄

白居易與劉禹錫書拓片



白氏長慶集序

浙東觀察使元稹字微之述

白氏長慶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居易字樂天樂天始
 言試指之無二字能不誤具樂天與予書始既言讀書勤敏與他兒異
 五六歲識聲韻十五志詩賦二十七舉進士貞元末進士尚
 馳竟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擯落禮部侍郎高郢始用經藝
 爲進退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
 遠求玄珠斬白蛇等賦及百道判新進士覺相傳於京師
 矣會憲宗皇帝冊召天下士樂天對詔稱旨又登甲科
 未幾入翰林掌制誥比比上書言得失因爲賀雨秦中吟
 等數十章指言天下事時人比之風騷焉予始與樂天同校
 祕書之名多以詩章相贈答會予譴掾江陵樂天猶在翰
 林寄予百韻律詩及雜體前後數十章是後各佐江通復

前言

白居易在創作上的主要成就是詩歌。他的許多詩歌，和李白、杜甫同樣真實地反映了所處的歷史時代，深刻地揭露了當時的社會矛盾，強烈地表達了人民的呼聲與抗議。在思想內容和創作方法上，對當時和後代，國內和國外，都發生過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同時，他又是一個卓越的文藝理論家，別具風格的散文作者。他所留給後輩的這份珍貴遺產，至今仍值得我們借鑑。

二

白居易（七七二——八四六），字樂天，晚號醉吟先生，又稱香山居士。先世太原人，至曾祖溫，移家下邳（今陝西渭南縣東北）；祖鎰，又移居新鄭（今河南新鄭縣），他就出生於新鄭縣的東郭宅。因他父親季庚曾在徐州作官，因此他的家屬又曾有一個時期僑寓在徐州符離縣（在今安徽宿縣符離集）。

他出生於一個沒落的官僚地主家庭，對於接受封建時代的文化教養有較好的條件。同時因爲『時難年荒世業空』，迫使他不得不從童年開始，就流轉四方。南而蘇、杭、宣、饒、襄、樊，北而邯鄲、太行，西而洛陽、長安，都曾印下他的足跡。這種生活，雖然較苦，但對詩人却是一種很好的鍛煉；擴大了他的視野，密切了他和廣大勞動人民思想感情的聯繫，爲爾後寫出大量反映民間疾苦的詩文打下了廣泛的社會生活基礎。

約與早年流浪同時，詩人生活的另一內容，是努力讀書寫作，準備參加科舉考試，同當時的士大夫子弟一樣，他想通過科舉，登上仕宦途徑，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從二十八歲開始參加鄉貢考試，到二十九歲進士及第，以及三十歲、三十五歲連中戶部和尚書省兩次特科考試，一共花去七八年的寶貴時光，從此算是勉強踏上了仕宦途徑。起初作校書郎，後來又作盩厔（今作周至）縣尉，授翰林學士，作左拾遺，當諫官。詩人的政治生活開始了，詩人的創作生活也開始了，而且很快就達到了旺盛時期。

在創作過程中，由於白氏的筆鋒舌劍，真正刺着了當權者的痛處，使他們『變色』、『扼腕』與『切齒』。因此立即受到對方一系列的排擠與打擊。三年左拾遺任滿，他不能繼續在朝廷立足，只能作一名京兆戶曹參軍（爲京兆府掌戶口簿籍、催徵租稅的官佐），從此詩人離開了可言的諫職，心中的憤慨是不言而喻的。

母喪休官（當時叫『丁憂』），退居渭上，使他進一步脫離政治生活，置身田園，接近了勞動農民，而且親嘗到封建統治者掠奪老百姓的況味，內心的感觸，是情見乎辭的。

休官期滿，雖然又算是回到朝廷，可是被任命爲太子左贊善大夫這樣一個閑冷職位，這本來已經够使他失意了，不料，還有更大的挫折在等待着他。

元和十年，盜殺宰相武元衡，傷御史中丞裴度，白氏首先上書請求追捕凶犯，當權者以其越職言事，懷恨在心，便藉了一個口實，把他趕出朝廷，遠去江州作一名有職無權的司馬。這是統治階級當權派對白氏最沉重的一次打擊。同時也是白氏所經歷的最嚴峻的一次考驗。

貶江州後，白氏在政治態度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不能不明顯地反映到他的作品中來。政治鬭爭的勇氣銳減，逃避現實的思想上升。佛道兩教成了他的避世津梁，泉石雲林成了他的寄情樂土。此時的創作，雖仍時露不平之氣，可是往往爲一種沉鬱感傷的情調所籠罩。『閒適』、感傷的作品在數量上突然增加，『諷諭詩』在數量上則顯著減少。他的詩作第一次結集於這一年的冬天，總結歷史上和他自己的現實主義創作傳統和經驗的《與元九書》也寫在這一年的冬天，看來都不是偶然的。江州之貶是白氏前後期創作的轉折點。

元和十三年（八一八）十二月二十日，江州司馬任滿，白氏奉詔改官忠州刺史，於次年三月到任。

忠州在當時是個偏僻的山區，生產落後，稅役繁重，人民生活困苦。他開始整頓地方行政，以刑均稅，

獎勵生產，積極想辦法使人民生活過得好一點。沒等任滿，朝廷又調他回京。這時憲宗李純已死，繼位的是穆宗李恆。李恆是個荒淫昏慣的皇帝。面對當時官僚黨爭，愈演愈烈；藩鎮叛亂，又若當年；他不是束手無策，就是處置乖方。這次詩人回京，雖然一連幾任京官，也照例上了一些奏摺，對軍國大政陳述了自己的意見，但很少被朝廷採納。於是在長慶二年（八二二）請求外調，至七月十四日，詩人又由中書舍人轉任杭州刺史。

詩人在杭州，『鰥惇心所念，簡牘手自操』；並注意興修西湖水利，疏浚李泌六井；充分利用地方官的有限職權興利除弊，爲人民做些好事。長慶四年（八二四）五月任滿，以太子左庶子被詔回京。可是先於是年正月，穆宗李恆死去，敬宗李湛嗣位，年僅一十六歲。愚蠢貪玩，不理政事，朝政完全被一些貪暴官吏所把持。因此白氏不願入京，到洛陽就停了下來。

敬宗寶曆元年（八二五）三月，白氏又解除庶子分司職務，出任蘇州刺史，以是年五月五日到任。白氏這回再次出任地方官，也和從前在忠、杭兩州一樣，爲人民做了一些好事。因此當他第二年離任的時候，『蘇州十萬戶，盡作小兒啼』（劉禹錫《白太守行》），老百姓對他戀戀不捨。

白氏北上途中，敬宗李湛爲宦官所殺；文宗李昂繼位。從此以後，白氏雖又連續受任西京長安、東都洛陽幾次官職，但均非愜意，政治生活可以說是基本結束。倒是他在武宗李瀍的會昌二年（八四二）以刑部尚書致仕（退休）以後，特意施散家財，協助當地人民，開鑿洛陽龍門八節灘以利漕運，可以

算是詩人晚年差足引以自慰的一樁義舉。

會昌六年（八四六）八月，詩人病逝，終年七十五歲。遺命葬於洛陽龍門山，李商隱爲作墓碑。

三

白居易生於大詩人杜甫死（七七〇）後二年，卒於王仙芝、黃巢等農民大起義（八七四——八七五）前近三十年，他的主要創作活動時期正處於這兩者之間。這正是唐朝自從『安史之亂』以後，社會諸矛盾繼續深入、擴大，全國規模的農民大起義正在醞釀、成長的時代。這一歷史時代的特點是：社會上的各種矛盾進一步激化，由統治階級內部分化出來的部分人士所發起的『永貞革新』（順宗）和『甘露之變』（文宗），一次比一次失敗得快，一次比一次失敗得慘。這一時期的歷史情景，正如許渾的著名詩句『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那樣，怕人的死寂、窒息的低壓，不諧和地結合在一起，在在預示暴風雨的即將來臨。但另一面，貞元、元和之際，唐代文化又出現一個豐富多彩的繁榮局面：小說有傳奇的興起，詩歌有詞體的創始，古文有韓柳的提倡。這些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都是了不起的大事。而白氏適逢其會，他既爲時代風氣所薰陶，又以自己傑出的創作，引導着當時的詩壇，把他們納入『裨補時闕（缺）』的軌道，這就是一般人所說的白氏所領導的『新樂府運動』的實質。前乎白氏，『新樂府』作者代不乏人，但目的並不一定都在『裨補時闕』；有的詩人雖然作到這點，但是還沒有來得及把創作經

驗加以總結，使它上升為理論。白氏則不僅僅有相當豐碩的創作成果，而且有比較完整的創作綱領和創作理論，分別系統地闡明在他的名著《與元九書》以及其他一些散文當中，而且也直接標舉在詩歌的正文和序引裏面。

作者在《與元九書》裏，對作家創作明確地提出了『救濟人病，裨補時闕』的戰鬥任務，十分具體地提出了『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響亮口號。這是一個現實主義的理論綱領，是從我國古代詩歌創作正反兩方面的經驗總結出來的。這個綱領，這種理論，既批判了六朝以來逃避現實的『田園派』、『山水派』的陶、謝詩風，也突破了三代以下詩人藉口『言志』而搞自我吹噓自我陶醉的狹隘傳統。過去《文心雕龍》、《詩品》反對江左頹風，但很不徹底；陳子昂、元結思革六朝餘習，而語焉不詳。白居易比起他的前輩，則顯然向前大大跨進了一步。所以對於這些論述應當給以足夠的重視。

白居易特別關懷勞動人民，在他的筆下，勞動人民不僅是辛勤的生活資料生產者（如《觀刈麥》的丁壯，《賣炭翁》的老翁），而且是古代世界最高水平的手工業技藝的熟練的掌握者（如《繅綾》和《紅綫毯》的紡織女工）。因此，他對當時勞動人民寄以深厚的同情，對他們所受的剝削，進行了深刻的揭露，表示了強烈的抗議（如《杜陵叟》：『虐人害物即虎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紅綫毯》：『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更加可貴的是：白氏還經常把勞動人民和剝削階級相對比，顯示兩個階級對客觀事物有着截然不同的感情和愛憎：如在《秦中吟·買花》裏，上面寫長安城裏的有閑階級，對於

牡丹迷戀成俗；而下面忽然一轉：『有一田舍翁，偶來買花處；低頭獨長嘆，此嘆無人諭。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就是很能說明問題的例子。最後，白氏還有極其難能可貴的一點，就是他雖身為官吏，但並不認為自己高人一等；倒是在農民辛勤勞動面前，想到自己不事農桑而坐食厚祿，不勝慚愧；如大家所極為熟悉的《觀刈麥》就是這樣。這實際是出身剝削階級的作家的自我批判。這種自我批判的精神，竟能出現於九世紀的作家，應當說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在同情勞動人民的同時，白詩有不少篇章（不限於『諷諭詩』），都接觸到婦女問題。

在封建社會裏，由於男子在家庭中處於絕對支配地位，由於一夫多妻制度的合法存在，即使是貴族婦女，她們絕大多數也無法擺脫年貌盛時被玩弄、衰時被遺棄的悲慘命運。因此在白氏筆下，她們也每是任憑命運擺布的受侮辱、受損害的人。例如《新樂府》裏的《上陽人》、《陵園妾》、《太行路》、《母別子》以及不屬於《新樂府》的《後宮辭》等，就都具有這種性質。但這裏需要附帶說明一下的是：白氏在描寫這些婦女的不幸遭遇時，大多數情況下只是借題發揮，而真正的意圖則在反映朝官的內部傾軋和進步勢力的受打擊和排擠。試看《太行路》的小序是：『借夫婦以諷君臣之不終』，《陵園妾》的小序是：『託幽閉喻被讒遭黜』，《母別子》的小序是：『刺新聞舊』，（按『新聞舊』，見柳宗元的《六逆論》，是當時統治集團內部新舊黨爭的政治口號，詳解請參考原詩注釋。）都屬於這一類，其中只有《上陽人》等少數篇章是例外。但客觀上儘管如此，我們仍然不妨這樣認為：白氏既同情被朝廷放逐的政治革新派，

又同情那些因遭嫉而被打入冷宮的不幸婦女，現集中有《請揀放後宮人狀》一篇，就是明證。因之上述這些詩篇，所借用的婦女問題的題材本身，就同時具有副主題的性質。

宮女的身份是奴隸，且有不少人是來自下層人民；因此對她們的不幸遭遇，就不能一律以宮廷貴族婦女的特殊遭遇來看待；而這就是《上陽人》等篇章，也仍然能够吸引廣大讀者同情的原因所在（開元末年，唐明皇李隆基派遣花鳥使從民間選拔宮女，呂向作《美人賦》以諷諫，作者在篇末特別點明這一點，值得注意）。

白詩寫婦女的名篇是《井底引銀瓶》和《琵琶行》。《井底引銀瓶》塑造一個『感君松柏化為心，暗合雙鬢逐君去』的大膽少女形象。這個少女不為封建家庭所容，與封建禮法格格不入，在當時說來，是具有叛逆性格的婦女形象。《琵琶行》的女主人公是一個有高度藝術才能和造詣的女性。她具有特殊的生活經歷，獨立的生活觀點，是屬於市民階層的婦女典型，也是天涯淪落的詩人的藝術化身。

白氏也沒有忘記為數更多的貧家女。她們雖然沒有被打入冷宮的幽閉之苦，却有老大獨居之恨，這在《秦中吟·議婚》一篇中有所反映。

《婦人苦》這首詩，體現了白氏當時對婦女問題的總認識。其中有兩句是這樣說的：『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這兩句話道盡了封建時代廣大婦女人格上處於依附地位的黑暗社會生活現實。

此外，白氏還描繪了一些出身寒族的知識分子，如唐衢、張籍等，他們大多數是有成就的詩人，在創作上和白居易的觀點相近，因之這些詩篇，往往體現着作者自己的創作觀點，對研究白氏的文藝思想，有一定的參考價值。還有一些在藝術上有特殊造詣的人，如善於畫竹的蕭悅，善吹簫箏的薛童陽陶，也都在他筆下寫得栩栩如生，令人崇敬。這些作品，往往是在描繪藝術家卓越成就的同時，也開發了詩人對某種藝術創作理論的獨特見解，能給予藝術家們以啓發和指導。

如上所述，廣大的農民、手工業工人、被壓迫婦女、出身地主階級較低層的詩人以及各種藝術家，是白氏同情、聲援以至歌頌的對象。另一方面，壓在這些人們頭上的是龐大的封建統治集團當權派及其爪牙，上自皇帝、大宦官、宰相、節度使、州刺史、縣令，下至鄉吏、里胥，則都是白氏揭露、批判和鞭撻的對象。皇帝是封建社會最大的剝削者和壓迫者，是廣大勞動人民飢寒交迫的總根源。用白氏的話說，就是：『人之困窮，由君之奢欲。』（《策林》二一標題）在他的眼裏，當時的皇帝，特別是德宗李适：『荒淫無恥，貪得無厭，橫行無忌，萃於一身』（《雜興》三首中的楚、越、吳三國的國王，都是中唐時代。當今皇帝『的化身』）。他們爲了滿足自己的窮奢極欲，不僅僅是通過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對老百姓進行敲骨剝髓的掠奪；而且還假手於他們的親信，借『進奉』爲名，對老百姓進行漫無止境的搜括。對此，舊唐書·食貨志有怵目驚心的記載。昏君在位，壞人掌權；太監（宦官）專橫跋扈，氣焰薰天（《輕肥》）；官僚紅燭青樓，金迷紙醉（《歌舞》）；州官忙於進羨（《紅綫毯》）；藩鎮只顧殺人（《贈友》第一首）；壞事

儘管是奴才幹的，而根源却是主子。因為『君之命令行於左右（宦官和宰相），左右頒於方鎮（節度使、觀察使等地方大員），方鎮布於州牧（刺史），州牧達於縣宰（縣令），縣宰下於鄉吏，鄉吏傳於村胥……上開一源，下生百端……君好則臣爲，上行則下效……故上苟好奢，則天下貪冒之吏將肆心焉；上苟好利，則天下聚斂之臣將竄（致）力焉……上益其侈，下成其私……』（《策林》二一）所以在他看來，皇帝貪官，上行下效；要反貪官，必反皇帝；反貪官只是反皇帝的起點，反皇帝才是反貪官的歸宿。從這樣一種基本認識出發，當他對黑暗的社會現實進行揭發和批判的時候，矛頭都不僅僅是指向貪官污吏，而最終必然要刺擊到皇帝；《重賦》篇『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爲塵』是如此；《輕肥》篇『借問何爲者？人稱是內臣。……果擘洞庭橘，繪切天池鱗（皇帝御賜）』是如此；《歌舞》篇『雪中退朝者，朱紫盡公侯（皇帝親近）』是如此；此外像《繚綾》篇的『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樣人間織』；《道州民》篇的『一自陽城來守郡，不進矮奴頻詔問』；《杜陵叟》篇的『昨日里胥方到門，手持敕牒榜鄉村；十家租稅九家畢，虛受吾君蠲免恩』；也莫不如此。即使下到掠奪炭工的『宮使』，搶劫郊區的暴卒，白氏也是絕不滿足於就事論事，而是一揭到頂。像《賣炭翁》篇的『手把文書口稱敕，迴車叱牛牽向北』；《宿紫閣山北村》篇的『口稱採造家，身屬神策軍；主人慎勿語，中尉正承恩』等就是。儘管白氏揭露皇帝，在態度上是有保留的，在手法上是比較隱蔽的；但範圍相當廣泛，鞭責相當有力，則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如果我們把這些材料匯合起來，那麼當時端拱深宮的皇帝的累累罪行，就大白於天